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评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王义桅 唐小松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格局的看法一度为乐观的自由主义所支配,尽管世人也曾翘首以盼多极化局面的出现。但近年来,现实主义却有卷土重来之势。首先是“一超独霸”的观点甚极一时,即一些大国争相讨好美国,奉行“跟着强者走”战略(bandwagon),而美国积极推进霸权战略。沃尔福思的“单极稳定论”思想首先揭开其序幕,库伯的“新帝国论”更是明目张胆地为帝国辩护。“一超独霸”的观点还远未偃旗息鼓,“9·11”事件后,人们又开始为另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忧,那就是,在美国重新武装的现实主义又悄然披挂上阵,新版的现实主义越来越带有浓重的保守性和“进攻性”(自由主义则被美国国务院规划室主任哈斯发展为“整合论”)。它突出表现为“一超多强”论,特别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具有不可避免性,其理论基础是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大国意志在陆地上的表现是成为地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米尔夏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区霸权(为了最安全的生存),而水域的阻遏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使全球霸权不可能实现;大国政治的历史是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s)的冲突过程,尽管全球霸权无法实现,但大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企图,因此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成功实现(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拿破仑、希特勒、苏联和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它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不可避免,因而作者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

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围绕冷战终结的争论中,米尔夏默就发出了“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的惊人论调。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战中,他一直扮演着重量级的角色,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

一 何谓“大国政治的悲剧”?

何谓“大国政治”、“悲剧”和“进攻”?正确理解这些核心概念是准确地把握本书中心思想的必要前提。

米尔夏默强调,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

那么,何谓“大国”?“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

参见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August 1990, pp. 35 - 50. 米尔夏默的另两篇文章“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Summer 1990), pp. 5 - 56 和“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 1995), pp. 5 - 49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

Ibid.

Ibid., p. 164.

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

其二，进攻性企图和权力与生存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作者认为，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

大国政治的悲剧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那么，何谓“进攻”？这主要指大国关系本质上处于进攻状态：整个世界是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人们不可能看到宁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

作者感情上并不喜欢这种局面，但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客观逻辑使然。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悲观理论”。因此，大国政治的悲剧是米尔夏默悲观式历史观、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二 米氏的权力政治学

作者明确指出，“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本书围绕六个问题对权力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国家争夺权力的根本逻辑是什么？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

Ibid.

Ibid., p. 35.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5.

第二,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大国行为的最根本问题。作者在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中给出了答案,即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结构鼓励国家追求霸权。第三,什么是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义和度量的?第四,当一个大国威胁要打破均势时,国家以何种策略获取和维持权力?第五,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何种权力因素使安全竞争的加剧及进而导致的公开对抗更容易或更难以发生?第六,在什么情况下,受威胁的大国会采取均势策略对抗危险的敌手,又何时企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受威胁的国家?

作者指出,“权力”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到底何种定义是正确的。事实上,一个学者的理论决定了一个定义的合理性。他的定义是否恰当取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政治。第三章“财富和权力”写道,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军事实力的对比情况。作者进而指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大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财富分配的变化。”

在第四章“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中,作者对各种权力类型进行了比较,特别是独立的海军力量、战略空中力量、地面力量和核武器等四类军事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观点:第一,地面力量是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一国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它的陆军及支持这些地面力量的海、陆、空力量。简单地说,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最庞大的陆军。因此,估量地面力量均势本身就能基本把握大国对手的相对能力。

第二,巨大的水体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特别是占地球表面很大部分的海洋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p. 12 - 13.

见此书第三章注释 1。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57.

那么,大国如何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呢?作者在第五章“生存战略”中作了分析:首先,他指出了国家在权力竞争中所追求的特殊目标,即在所控制的地区内争夺霸权、大国也追求财富、大国渴望在它们所处地区内拥有最强大的地面部队,以及大国寻求核优势。其次,他分析了国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改变均势,以及阻止其他国家做出不利于自己均势变化的不同战略。作者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战争”是国家获取权力所采用的主要战略。此外,他还分析了“讹诈”(Blackmail)、“诱捕”(Bait and Bleed)、“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和“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等战略,认为“建立均势”(Balanc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是大国用来阻止敌人颠覆均势的主要战略。

最后,作者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国家战略中,有三个中心点:战争是增加额外权力的主要战略,而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是维持均势的主要战略,无论何时,受威胁的国家更愿意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建立均势。

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在第九章“大国战争的原因”中,作者认为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冲突的可能性,但冲突的几率则要视体系中主要国家(leading states)间的权力分布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既考虑极性又考虑体系中主要国家间的均势,认同两极比多极更稳定的观点。作者对多极体系中是否存在一潜在的霸权做了进一步区分,其结论是:“两极体系最倾向于和平,而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最容易导致冲突。平衡的多极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在这一章的末尾,作者指出,任何时候,当多极体系包涵拥有最强大军队和最富有的国家时,大国间战争就更可能爆发。

尽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但被威胁的国家何时追求均势、何时推卸责任?作者在第八章“均势与推卸责任”中提出,在两极体系中,受威胁的大国不得不站出来抗衡对手,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承担责任(catch the buck)。而在多极体系中,被威胁国家能够而且经常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次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威胁的程度与地缘因素。潜在霸权的相对权力越多,体系中被威胁的国家就越有可能摒弃推卸责任战略,形成一种均势联盟。

总之,作者认为,在两极体系下,大国不可能推卸责任,而多极体系中则很普遍。只有当多极体系中存在一个特别强大的霸权而且入侵者与受威胁的大国间不存在缓冲地带时,才不存在推卸责任现象,在缺乏支配性威胁和共同边界时,多极体系更有可能出现推卸责任行为。

三 作为现实主义理论新发展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书中,作者根据“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将现实主义区分为人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如下表。

主要现实主义理论

	人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
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是什么?	国家内在的权力欲望	体系结构	体系结构
国家想要多少权力?	所有能得到的国家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	不多于所拥有的国家注重维持均势	所有能得到的国家使相对权力最大化把霸权作为终极目标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与摩根索不同,沃尔兹并不认为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在于追求“生存”这一目标,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使其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因为“过多的权力”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联合抗衡。因此,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

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看来,“进攻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导致冲突和战争频频发生,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正如米尔夏默所指出的:“国家最初的动机是防御性的,但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去作进攻性的思考,有时则是采取进攻性行动。”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追求霸权的国家为什么不担心其他国家组成均势联盟反对它？米氏认为：“受威胁的国家常常会采用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战略，因为在战争爆发时，推卸责任者可避免与侵略者打斗的代价。”这就突破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本书一再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是通过世界是如何组成的五个假设来界定的，包括如下的几点事实基础：(1) 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处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该体系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 大国都具备一定的进攻性军事能力。(3) 一国无法确定他国是否怀有敌意。(4) 大国高度重视生存。(5) 国家是理性行为者，能理智而有效地设计使其生存机会最大化的战略。

作者指出，上述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很可能是，某一国家抱有敌视意图，但它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首先，大国彼此畏惧。作者认为，大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畏惧的根源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击能力和不信任。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没有国家之上的权威机构帮助它，也没有任何方式使侵略者受到惩罚。因此，它们不得不随时为战争做准备。

第二，自助原则。作者认为，由于政府之上没有政府，因此，国家彼此皆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别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靠自己。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自助原则并不排斥国与国之间建立联盟，但是联盟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盟友。

第三，权力最大化原则。作者认为，由于惧怕他国，必须自助，因此，大国最佳的安全保障就是成为系统中最强的国家，一国越是强于对手，它受攻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139.

Ibid., p. 32.

击的可能性就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相差越大,强国受弱国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理想的局面就是成为系统中的霸主。

四 当理论遭遇实践:尴尬与危险

根据林恩·琼斯(Sean M. Lynn-Jones)的分析,本书是“继1979年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后对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理论的最重要贡献……此书论述非常清晰,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它将成为许多国际关系课程的标准教材。”诚如所言,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广泛反响,美国许多大学已把本书列入了国际关系课程的参考书目。

就理论而言,本书对现实主义作出了两大贡献:(1)米尔夏默翔实地界定了权力,并尝试为其设立度量标准。他认为,大国并不经常在“均势”与“跟着强者走”两种行为间选择,而是在“均势”与“推卸责任”间徘徊。这就补充了联盟形成理论(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2)米尔夏默将地缘因素重新带入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一国是否邻近海洋、缓冲国或威胁性大国,影响到其联盟选择与扩张倾向。

从实践方面看,本书揭示的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外交行为、对21世纪世界战争与和平趋势的预测,特别是“中美安全冲突不可避免”论,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

首先,关于美国的外交行为。

在该书第一章“导论”末尾处,作者对美国领导人惯于言行不一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的,但在国际体系中美国却是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流露但并未挑明的美国精神世界的“例外论”思想。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有两大不信任引人注目,这就是对内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主张“三权分立”,推行自由主义的民主逻辑;对外不信任外部世界,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是现实主义逻辑的天下。

Sean M.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April 2002.

因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解释的都是别国的行为,现在的美国永远例外。这种莫名其妙的例外论往往赋予美国以神圣的使命感、道德感,并以“人道主义干预论”等为其鸣锣开道。对此,作者指出,“美国是现代唯一获取了地区霸权的国家。这种伟大成就并不是它所声称的对外部世界的高尚行为,而是美国例外主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真实基础。”例如,该书指出:“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尽管是仁慈的占领者,但它仍不允许这两个盟国建立一个大国所需的军事力量。”“它决心保持在西半球的霸权。但是由于投送力量越过大片水域难度大,美国不会在欧洲和东北亚把军事力量用作进攻目的。事实上,美国的盟友更担心美国军队会调回国内,而不是担心这些军队会征服它们。美国这种在西半球以外不具称霸动机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没有形成针对美国的均势同盟。”

米尔夏默强调,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家属性是不重要的,不同国家都遵循同一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但事实上是美国之外的国家不重要,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所使,而苏联则不然。”

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寻找逻辑基础的现实举措,正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约瑟夫奈语)。

其次,关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这是全书各章基于无政府状态与权力分配的实际效果两条线索得出的结论。作者在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中说,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权。这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Summer, 1977), pp. 41 - 60.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36.

Ibid., p. 79.

Ibid., p. 382.

Ibid., p. 24

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权。但如果一个地区霸权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

作者在第十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中明确提出,美国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与之匹敌的对手正是崛起的中国。这是作者权力观的必然逻辑。如前所述,作者把人口与财富视为军事权力的原动力,而军事权力决定了一国的外交走向,军事权力中最重要的是陆地力量,即征服领土的军事能力。因此,“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在作者看来,中国正是这种具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作者推断,基于人口与规模,以及飞速增长的经济,中国不可避免地怀有对国际体系的修正企图。因而,在冷战后的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容易爆发中美间激烈的安全冲突。“今天,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12亿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挑战美国。”“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声称其他国家不能干涉西半球一样,中国也将表明亚洲是不容美国干涉的”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说,“美国可能在朝鲜和台湾两个问题上与中国不可避免一战”。

本书开篇即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其领导者的公开言论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理解,而且美国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米尔夏默一方面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中言辞与实践的矛盾,另一方面又陷入了美国例外论的怪圈,难以摆脱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情结,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

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国际关系学博士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国际关系学博士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42.

Ibid., p. 135.

Ibid., p. 401.

Ibid., p. 56.

Ibid., p. 375.